

第一章 緒論

第一節 中文教育的涵義

香港自從開埠以後，百多年來，華洋雜處，商旅繁集，漸漸發展而成為東方的主要商港；同時，四方人文，薈萃其間，也是一個中西文化交流的樞紐。

生活在這地方的人們，不論是居民或為過客，他們相互之間，來往言詞，應用書契，藉以溝通思想，表情達意的，皆以中、英兩種語文為主。而香港人口之中，歷年以來，又以中國人為絕大多數，佔人口總數百分之九十八以上，是以中國語文的流通最廣，運用最大。

香港中國語文發展的三個時期

香港的中國語文，從歷史的進程上，在稱謂方面，約可分為三個時期：

(一) 唐文時期

從一八四一至一九〇〇年左右。在這時期內，本港的外國人，通稱中國人為「唐人」。在他們的心目中，所謂「唐人」，其特徵便是女的纏足；男的薙髮，頭戴卜帽，拖著一條長長的辮子。

那時，在書院中讀英文的，稱為讀番書、寫番文、學番話；讀中國書的，則稱為讀唐書、習唐文、寫唐字。學塾中教授中文的老師，稱為「唐書先生」。^[1]在一九二五年左右，以教授金文泰總督中文著稱的宋學鵬，也還被稱為「唐文大先生」。

(二) 漢文時期

在一九〇〇年以後，已普遍改稱唐文為漢文。一九〇四年，皇仁書院有「復設漢文」這回事。同時，這時期《黃龍報》(The Yellow Dragon)所登載的，幾篇以中文寫作的文章，也多用「漢文」一詞，並稱那時的中文



老師為「漢文教習」。當時之所以改稱「唐文」為「漢文」，大概與外國人之熱心研究「漢學」有關。對中國學問的研究，既稱「漢學」，那麼，中國文字，自然便稱為「漢文」了。這是很合理的稱謂。

一九一四年，政府設立漢文師範於官立實業專科夜學院；一九二〇年又設立漢文師範學堂；一九二六年，金文泰總督為提倡漢學，更設立官立漢文中學一所，以漢文視學官李景康為校長；政府設立的小學，其中有幾間也稱為漢文小學。

(三) 中文時期

一九三一年以後，中國僑務委員會成立，本港僑校，紛紛向中國政府呈請立案，並參加廣東教育廳所舉辦的中學會考。這樣一來，為了適應內地課程，對中文科的稱謂，便漸漸與內地一致。「漢文」一詞，也漸而被「中文」所代替了。

及至一九三七年，中日戰爭開始以後，廣州學校遷港的不少，學生、教師及文化人士，也大量進入香港，大家均以「中文」為中國語文的正確稱謂，把本地的「漢文」觀念，大大的沖淡。甚至在戰後設立的中學會考，也稱為「中文中學會考」，一九六三年成立的一所大學，也稱為「中文大學」了。

我們從香港歷史上，唐文、漢文、中文的三種稱謂，正可以看出中文在香港發展的三個不同的時期，並代表了三個不同的時代意義。唐文時期，是代表中國傳統舊教育的時代；漢文時期，是受外國教育影響的時代；中文時期，則是受祖國及時代的影響，推行新教育的時代。

中文教育的涵義

語言，是人與人之間，直接交換思想，表達意見的工具；文字，則除了代替語言的作用外，是傳播和記錄文化活動的主要工具。語言和文字，都是一種傳播的工具，只是文字比語言，更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罷了。而語文是各有其民族形式的，任何一種民族語文，都是一種民族文化的產物。中國語文，自然是中華民族經過長時期的創造和發展而形成的一種文化產物了。

所謂中文，是指中國人相沿習用的一種語言文字。凡是中國人，在生活習慣上，自小即習用這種語文，成為自己的一種母語。在香港，一位中國人，即使是精通英文的，他的英文，也絕不可以完全代替了自己的母語，因為他到底是一個中國人，他和他的民族文化、生活習慣、社會關係等等，有著極密切的血緣關係，而且是息息相關的。也可以說，他的生活意識，和他自己的民族及社會所給予的教育，有深厚的關係。

教育的基本目標，不外是知識的傳授與人格的培養。關於後者，我們中國的教育比外國教育，更為重視。甚麼叫做中文教育呢？簡言之，凡是用中國語文作為教學的主要媒介，以達成教育的目標的，便是中文教育。

在中國內地，所實施的教育，根本就沒有所謂「中文教育」或是「外文教育」之分。凡是學生，在開始求學的時候，一律接受本國語文的訓練，以中文為學習的基礎，為學習知識的媒介。一個人除非不接受正式的教育，要接受正式教育，首先學習的便是中國語文。在這情形下，自然不會產生有所謂「中文教育」這回事了。雖然，內地的學校，也有外國語文的學習，一般來說，那只是一個學習的科目，或是作為一種專門的修習與研究而已。

我們在香港所發現的情形則不然，香港的學校，顯著地分為二種類型：一種是以英文為教學主要媒介的英文學校；一種是以中文為教學主要媒介的中文學校。這兩種類型的學校，非但教學的主要語文不同，而教學的內容相差很大，學校的風格也有差別。大抵上，英文學校，以英文為主，中文只是一個普通的科目；教育制度及教學內容，以英國教育為依據；學生受外國思想的影響較大，態度趨於新潮。中文學校，則以中文為主，英文是一個普通的科目；教育制度及教學內容，以中國教育為依歸；學生受中國傳統思想的影響較多，態度較為持重。這兩種類型的學校，既然有這麼大的分別，很顯然的，英文學校以英文為重，中文學校以中文為重，各樹一幟，便形成了兩個不同的體系，而有所謂英文教育與中文教育之分。

我以為，在香港來說，中文教育，不單只是指語文的學習，它的涵義，應包括下列幾點：

(一) 中國語文的學習

學習中文，掌握中國語文的運用，應該是每個中國人的天職。一個中



國人，對本身的語文沒有認識，不懂運用，不只沒法接受傳統的文化，而且是一件可恥的事情。

(二) 以中國語文為教學主要媒介的科目學習

學校裏教學的科目繁多，除中文、數學、歷史、地理外，還有生物、化學、物理、音樂、美術……等等。凡是用中國語文作為教學的主要媒介的，都是中文教育的一部分。

教育中國學生，以他們所最熟識的母語為教學的媒介，在教學的過程中，必然易於了解和接受；教學的效果，也必然會事半功倍。

中國語文，源遠流長，詞彙豐富，對事物的表達能力至強。即使是一些科學上的新名詞，只要經過適當的翻譯，便可迎刃而解；抑且由是而使我們的詞語，與時俱進，更形豐盛起來。

(三) 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習

中國文化，有悠久的歷史，也有輝煌的成就。傳統文化，不論是物質的或是精神的，都是經過先哲們的努力創造而成。就以我們民族固有的道德、知識和能力來說。固有的道德是：忠孝、仁愛、信義、和平；固有的知識是：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這是一套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，同時，也是對於人類社會的一種重要觀念。至於固有的能力，則有：指南針、印刷術、火藥、磁器、茶葉、絲綢……等等的重要發明。^[2]此外，歷代政治制度、學術思想以及文學藝術之興盛，充分表現出中國民族精神文化與創造力的偉大，和文化領域的廣闊浩瀚。

我們對於過去已有的民族傳統的文化瑰寶，作為一個民族的子孫，是有責任去把它繼續承受過來，且予以發揚光大的。

中國的傳統思想，認為教育的作用，不只是知識的傳授，同時更顧及人格的培養方面。因此，讀書人除了有豐富的知識外，還要養成偉大的人格。

近年來，歐美各國，對於中國的文化學術，認識日多，評價日高，紛紛設立研究漢學機構，以鑽研中國的文化學術思想，且大力鼓勵學生研習中國語文，蔚成風氣。反觀我們香港的青年學子，往往視學習中文為畏途，大有數典忘祖之態，言之汗顏。一個中國青年，如果對本身的語文和傳統文化，沒有一定程度的認識，這個人的民族意識一定很薄弱，而民族的自尊心也很容易便會喪失掉。

在目前，香港社會道德風氣日趨敗壞，青少年生活日益放蕩不羈，倫理觀念動搖，治安情況日差的時候，推廣中國文化的研習，還可收到潛移默化和穩定社會的功效。

（四）對中西文化交流及其推進方法的探討

既然香港不僅是一個國際性的商埠，而且是一個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，我們在這特殊的環境中談中文教育，除了要研習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外，還要研習它與外國文化的互相交流之道。換言之，我們要從事研習怎樣吸收西方的文化學術，和怎樣把中國的優秀文化介紹到外國去，使西方人士對中國文化有更正確和深刻的認識。要做到這一點，我們對中國語文和傳統文化便要有較深厚的修養，而對外文的研究也要有良好的基礎。這樣，才能兼採中西文化之長，融會貫通，而達到互相交流的目的。其中翻譯工作，便是一項重要的課題。

在今日的世界裏，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文化，決不能以抱殘守缺為滿足；如果不緊隨世界文化潮流前進，與其他國家、民族，並駕齊驅，則有被時代遺棄的危險。

自然，中文教育的推進與提高，是多方面的，學校方面、社會方面，甚至家庭方面，對學習者均有影響。其中，能夠有計劃、有系統、有步驟的去推進，還是以學校教育為主。以下本書所談的香港中文教育的發展，也將以學校教育的發展作為主要說明。

中文教育在香港的任務

生活在香港的中國文化界人士和教育工作者，對於中文教育的提倡和推廣，負有四項重要的任務：

第一、普及中國語文的教育和學習，使廣大的海外中國人，都能夠正確而方便的使用中國語文。

第二、努力傳播我國寶貴的文化遺產，並設法向外發揚而光大之。

第三、不斷吸取外國語文及文化的優點，使中國語文的內容與形式，不斷充實、創新，更能適應世界文化的進步與發展，與時俱進。

第四、真正確立和提高中文在香港的法定地位，使中文與英文的地位

完全平等，平衡發展。

對於中文教育的提倡和推廣，自然不是隨口說來的那樣容易。在香港來說，它是遭受到社會的和政治的因素的限制，以致陷於萎縮的狀態中。所謂社會的因素，是指香港是一個重視英文與輕視中文的社會，凡事都以英文為主，不論是政府的公文上，商業的應用上，盡屬如此。所謂政治的因素，是指香港政府，一向未有正式承認中文為法定的語文，中文不能與英文處於平等的地位。由於地位上得不到政府的合法承認，間接即使人意味著，這是政府對中文的輕視和壓抑。

近年來，香港一般社會人士與廣大的居民，都主觀地提出，要求政府將中文確定為法定的語文。政府在這方面，也表現出很大的誠意與努力，逐步予以實現。一九七四年二月，承認中文為法定語文的法案，已在立法局獲得正式通過了。然而，其他實施方面的細節問題，還須我們不斷的努力，才可達到真正法定的目的。如果法定以後，徒具虛文，那也是沒有實際的好處。

香港政府規定中文為法定語文，在官方的使用方面，使中文達到與英文完全平等地位的時候，非但香港社會中的種種隔膜得以消除，民意得以溝通，成見得以化解，社會得以安定，繁榮得以繼續，而中文教育也將相應的獲得發展，中文程度自然隨之而提高起來了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，中文已是聯合國中五種法定語文之一了。在我們小小的香港，卻居然有官方的華人大官，在民眾促請政府早日承認中文為香港的法定語文時，認為「中文不夠表達能力」，這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嗎？

願英國政府，在中、英兩大民族互相尊重的原則下，積極確保中文地位的提高，使中、英語文在香港的使用和發展，並行不悖，對於香港局面的安定與繁榮的持續，有莫大的關係。這是中、英民族平等和互相尊重的象徵，也是二十世紀的今天，殖民主義者應有的明智之舉。

附注

[1] 一八九四年陳鏗勳著：《香港雜記》，第十一章〈華英書塾〉中，有「唐書先生」的稱謂。

[2] 參閱孫中山著：《三民主義》中的〈民族主義〉第六講。



第二節 香港教育的背景

歐洲的命運注定要統治亞洲？

在香港早期，曾擔任過政府督學的歐德理博士（Dr. E. J. Eitel, 1838–1908），於一八九五年，在他所著的《一八八二年以前的香港歷史》（*Europe in China,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*）一書的序言中，曾說：

兩千年來，文化的發展是由東向西的：歐洲為亞洲所指導。基督教使歐洲文化為之抬高，現在（按：指十九世紀末葉）的發展，則是轉過頭來，由西向東了：歐洲的命運注定要統治亞洲。

歐德理的話：「歐洲的命運注定要統治亞洲」，讀起來似乎有點過分，也有點囂張。可是，歷史是無情的，百年來，亞洲的許多地區，確是被歐洲人所統治。亞洲的文明古國，像印度和中國，在歷史上的一個時期內，也確實處於歐洲勢力的威迫下，過著苟延殘喘的日子。

在古代，中華文化是東方文化的主流，對人類文明，曾有過許多重要的貢獻。例如指南針、火藥、印刷術的發明，傳入歐洲以後，直接影響和啟發了歐洲的現代文明。這是舉世共知的事實。

可是到了後來，歐洲的物質文明日益發達，古老的亞洲帝國，便抵不住歐洲勢力的向東發展了。

西方勢力進侵中國的方式

從明朝末年開始，西方民族與中國接觸，大概是循著三種方式進行的。

第一種方式是傳教。由明朝萬曆年間（一五七三至一六二〇年）開始，相繼來華的西方傳教士中，最著名的有：意大利的利瑪竇（Matteo Ricci, 1552–1610）、西班牙的龐迪我（Diego De Pantoja, 1571–1618）、德國的湯若望（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, 1591–1666）等。這些人，把近代科學方面的知識，輸入中國，影響不小。總計明、清之際，西方各國教

士，到中國來傳播宗教及西洋學術的，不下六、七十人；所著書籍，也不下三百餘種。這些傳教士們，遠道來華，多以輸入科學知識為手段，而以傳教為目的。其中有些傳教士，也兼負有某種政治性的特殊活動。

第二種方式是通商。自明朝中葉嘉靖年間（一五二二至一五六六年），葡萄牙人租借澳門，以為對中國通商的根據地後，歐洲各國商船，來華的漸多。清朝初年，歐人與中國通商，以廣州和寧波兩地為最盛。由於中國工業不發達，自開五口通商以後，洋商在中國的勢力，便逐漸由沿海而侵入內地；中國的經濟權，也漸漸落入外國人的手中，甚至連本國的海關也歸外國人所管轄了。因為中國海關落入外國人的手裏，中國與外國通商，便失去了屏障。外國在中國所進行的經濟侵略與壓迫，使中國資金，大量外流，這樣，中國經濟便瀕於崩潰的地步。

第三種方式是戰爭。西方國家與中國通商後，都希望在華佔有較大和較特殊的利益。可是當他們的願望沒法達成的時候，便以武力逞強而為了。以武力去奪取利益和達到他們的野心，這種方式，便是戰爭。

道光二十年（一八四〇年）英軍陷舟山，侵寧波；

道光二十二年（一八四二年）英軍陷吳淞，逼江寧；

咸豐十年（一八六〇年）英、法聯軍破天津，入北京；

光緒十一年（一八八五年）法軍侵澎湖、台灣，佔安南；

光緒二十年（一八九四年）中、日甲午戰爭，中國海陸軍皆喪師；

光緒二十六年（一九〇〇年）英、法、俄、德、日、奧、意、美八國聯軍破天津，入北京。

上述這些戰爭中，中國方面，每戰的結果，皆喪權辱國，損失慘重。然而，卻因此而刺激起中國人民的革命思潮，從而掀起革新政治與革新教育的巨大運動。

英國選擇香港為割讓目標的原因

中、英鴉片戰爭的結果，中國慘敗，一八四二年中，滿清政府根據《南京條約》的議和條款，便將香港這地方割讓給英國。

香港，是珠江口外的一個小島，孤懸海上，幅員很小。為甚麼英國當



時要選擇這個地方為割讓的目標呢？其動機可說是商業的，同時也是軍事的。香港位於珠江口外，水道交通便利，與廣州和澳門相去不遠，適合英國商人的居停和貨物的存放，對於貿易，十分方便；而這裏港灣水深，利於船隻的停泊和避風，又據於南中國出入口的要衝，地位非常重要。這是英國人選擇這個地方的主要原因。

在歐、亞航道未通，中國海禁未開的時候，歷代均視此地為邊鄙之區；迨清初康熙年間（一六六二至一七二二年），十七世紀末與十八世紀初之間，由廣州循海道而至汕頭、廈門、福州、上海等地，都打從香港經過，這地方才漸漸為人所知道。九龍半島和新界的開發則較早。

現在我們所稱的「香港」，是含有狹義的與廣義的兩種解釋。狹義的範圍，是單指香港島的本身而言；廣義的範圍，則是包括九龍、新界、香港島的本身，以及周圍所統轄的大小島嶼在內。普通對外來說，所謂香港，是包括了香港、九龍、新界和各島嶼的一個總的名稱。

香港教育的特殊背景

香港的教育，從歷史的發展上去研究，是有它本身的特殊背景。

它的背景是甚麼呢？大約可以分做歷史、文化、社會和經濟四方面去說明：

（一）歷史方面

十八世紀的下半期，英國產業革命開始，首先是機器的發明。一個人所管理的機器，可以抵得上幾十人或幾百人的工作。由於機器的運用，使生產量大為增加。而生產量之突然的飛躍增加，自非內地市場所能容納，則對外擴大貿易，尋求海外市場，以謀商品的向外推銷，便成為必然的結果。一八四〇年，中、英鴉片戰爭，表面的事實是英國向中國推銷鴉片，而中國則嚴禁鴉片輸入，於是發生戰爭。其實，戰爭的基本原因，是由於英國的向外發展，要在中國取得通商的自由，並奪取在中國通商的根據地。鴉片問題，只是一個導火線罷了。不過，這次的鴉片戰爭，在我國近代史上，卻是一件劃時代的事件，而且是一次真正的外族入侵。因為自此以後，中國門戶洞開，強鄰環列，侵略事件相繼而來，使中國領土的完



整，主權的獨立，遭受到無情破壞，將國家降至次殖民地的地位，皆由這次鴉片戰爭以開其端。

鴉片戰爭的結果，於道光二十二年（一八四二年），依據《南京條約》，將香港島永遠割讓予英國。咸豐十年（一八六〇年），英、法聯軍攻入北京，中、英又訂立《北京條約》，把九龍界限街以南領土及昂船洲割讓給英國。這一帶地方，當時稱為九龍司。光緒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年），英國援用法國租借廣州灣的例子，強迫清廷簽訂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》，租借九龍界限街以北、深圳河以南的領土，及海中二百三十五個大小島嶼，租期為九十九年。我們便稱這地方為新界。以上所說的，便是香港殖民地的產生和擴展的簡單歷史。

就歷史背景而言，香港自從成為英國的殖民地以後，百多年來，在英國勢力統治之下，影響所及，於文化教育方面，產生了兩種顯著的特點：

第一、在較安定的社會中自由發展起來

百多年來，香港的教育，除了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為日軍入侵，受到破壞外，一直都在安定的狀態下自由發展起來。在這百多年中，中國內地屢次發生的紛爭局面，不但不會妨礙到香港，反而助長了香港社會的繁榮和教育的發達。同時，這個地方，更成為中國文化人士及知識分子的一個避難所。例如：一八五〇年的太平天國運動、一八九八年的戊戌政變、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、一九一三年的二次革命、一九二六年的國民革命和一九三七年的抗日戰爭等。在這些動亂的事件中，中國內地許多富貴人家和知識分子，都以香港為他們避難的目的地。

第二、帶著濃厚的殖民地意識

香港自開埠以後，百多年來，文化教育事業，自然受著殖民地政策的影響；換句話說，香港的文化教育，帶著濃厚的殖民地意識。而殖民地意識的特點之一是思想自由，但國家與民族的觀念，非常薄弱；其次是文化教育商業化，一切以功利思想為依歸。

（二）文化方面

香港，從地理的關係來說，是中國內地的一部分；從人口方面來說，百分之九十八以上都是中國人。香港的中國居民，差不多都是來自中國內地，他們的風俗習慣、文化活動，實與中國內地無異。同時，香港又是英

國的殖民地，經過了百多年來英國文化的傳播、感染，英國人的生活習慣、文化傳統，對香港的影響，著實不小。

甚麼是文化呢？文化的內容是多方面形成的，舉凡文學、藝術、科學、哲學、政治、經濟、法律、宗教，以至於一民族中的衣、食、住、行、娛樂、起居，其方式與其儀節，都同樣的是文化事象。^[1]

語言、文字，是一種民族形式的主要文化產物，是構成一種民族文化最重要的一環。生活在香港的中國人，除了絕少絕少的人以外，他們都是講中國話、看中文報紙的。即使有些人，他出身於英文學校，做事的地方是外國洋行，學習英文的時間比學習中文的長久，然而，畢竟他還是一個中國人，怎可以完全揚棄那與生俱來的社會關係和本身的傳統語文呢？事實上，每一個人自小即接受其本身的民族文化與母語的教導，特別是我們的華人家庭及社會，對於中國固有的文化道德的薰陶，素所注重。故此，許多讀洋文的人，儘管口中操著流利的英語，而其思想及生活方式，骨子裏，還是以中國文化為其神髓的。

有人說，中西合璧是香港文化的特徵。在香港這個華洋雜處的自由社會裏，人們生活和思想的表現，同時接受著中國和西方文化的雙重影響，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。關於這一點，我們可以從人們的日常生活中，找出許多實例來：許多人舉行結婚典禮，已經在婚姻註冊處披紗行禮了，而回到家裏的時候，又得拜天地、謁祖先、叩翁姑，照中國的傳統禮法，熱鬧一番；許多人居住的地方，中國式的大屋，裏面是西式間格與陳設，或是西式洋房，裏面是中式擺設的也不少；許多人在談話中，喜歡夾雜著幾個英文字；利用西方樂器的小提琴和結他去伴奏廣東粵劇的唱曲；古裝粵劇，改用英語對白歌唱。這些都是中西合璧下產生出來的香港文化。

在優越的地理環境之下，香港在過去的百年來，便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樞紐。

香港開埠以後，傳教士們紛紛而來。除了傳教以外，他們多從事文化教育工作。辦理學校、翻譯和出版等，都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工作。就以理雅各博士來說，他是一位傑出的牧師、教育家和學者，一八四三年來香港，除了傳教、辦學以外，還與中國學者王韜合作，把中國的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，整套翻譯成英文。這種巨大的成就，在中、英文化交流史上留

下了光輝的一頁。其他在溝通中西文化這方面著有成績的人也不少。

中西文化交流，不僅可使中國人的眼光放大，頭腦豐富，心靈活潑，還會使中國的優秀文化，融匯於世界文化的洪流中。

香港，在中西文化交流當中，自然又以中、英兩國的文化為主體。中、英兩國，都同樣有著深厚的文化傳統，這兩種文化傳統，直接地影響香港的文化和教育的發展。

香港既是一個中西文化交流的地方，中國文化與西洋文化在此匯合交融，其表現於教育方面的，便是中、英文的並重；其影響於文化方面的便是新思想的產生。中、英文的並重發展，可為本港學校特色之一；新思想的產生，可以何啟、胡禮垣、王韜等的鼓吹興辦洋務與變法圖強，及孫中山先生所鼓吹的革命思想為代表。

(三) 社會方面

我們生活在香港，由於政治環境的特殊，雖然這僅是一個彈丸之地，也談不上甚麼民主，然而，人們卻可享有充分的自由。因此，我們說，香港是一個自由的社會。生活在這地方的人，他們的活動，只要不會危害到這殖民地的安全，大致上，英國政府是不會過分干預的。這是一種很重要的因素，它使香港社會，在自由、安定之下日趨繁榮。

在自由、安定的環境裏，宗教、社團顯得特別發達。在信仰自由的基礎上，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佛教、回教、孔教、道教……等，非常興盛，各立門戶，聖道紛紜。特別在神誕緣會的時候，場面的熱鬧、認真，恐怕比任何地方來得普遍。有時候真使人懷疑，香港是否仍是一個神權的社會？社團的設立也是鼎盛的：有慈善團體、有宗教團體、有文化團體、有宗族團體、有商業團體、有地方團體、有職業團體、有娛樂團體……更有秘密組織的黑社會團體等。這些團體，種種式式，會社之多難以羅列。除了那些非法組織的黑社會之外，其他的會社，它們於求取本身的福利以外，對社會福利，尤其是教育事業，也多熱心以赴。

香港就是這樣的一個社會，中外古今的思想學說和事事物物，都能兼收並蓄。從教育的觀點來看，這社會裏有最進步的新教育，也有最落後的舊教育；同時，東西方教育，中外人士，諸式人等，都能在香港教育的圈子裏，和睦相處，自由生存，各謀發展，可算難得。



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，英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殖民地。英國人在殖民地的統治方面，固然有豐富經驗，有其獨到的一套；但這與英國的民族性、哲學思想，也是有關的。有人說，英國人的傳統思想，在政治哲學與人生哲學方面的表現是：

組織則求其合用而不求其有條理、系統化；制度則求其適應事實而不斤斤整齊劃一、名稱一致；思想則求其緩進而不求其急進，求其會通而不求其徹底；因襲則求其順情而不求其合邏輯，求其無礙而不求其理論一元化。^[2]

這幾句話充分說明，在英國統治下的社會，其種種制度，沒有完整的系統可言。其發展只是根據實際需要，只要不發生亂子，便任由它的存在，到了實際需要時，才作出適當的整理，應付便算。證諸過去的香港社會，英國政府所運用的政治哲學，正是這麼一套。怪不得多年來，香港教育政策的舉棋不定，教育制度的反覆、混亂，是有原因的。

（四）經濟方面

本港地少人多，經濟方面，全靠商業的發達，以資維持。在優越的地理環境之下，香港成為中外交通的咽喉，來往貨物的集散地，是一個國際的大商港。

從商業的觀點來說，商業是講求交換價值的，是著眼於利益的追求的。故此，人們的觀念，一般都是非常現實，腦海中充滿了功利主義的念頭。香港社會的經濟，自然是屬於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範疇。資本主義社會裏面的經濟活動，是主張自由競爭的。既是自由競爭，就脫不了功與利的念頭了。

功利主義思想發展的結果，求學的人，也多作出急功近利的打算。香港既是一個國際性的大商港，商業發達，商號林立，對外接觸、通商，均以英文為主要媒介。這樣，顯示英文的實用價值最大。因此，早期的香港，在人才缺乏的情形下，那些稍通英文的人，中學還沒有讀完，已非常吃香，往往便給商行以高薪羅致。是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，便形成了一種觀念：只要熟識英文，便可得到高薪水和良好的職位了，又何必要多讀書和進一步去研究甚麼學問呢？自然，學習中文，也就成為一件次要

的事情了。

每一個社會的基礎，都是由它的生產方式和經濟組織來決定；而生活在這社會裏的成員，也是不能完全脫離這社會的經濟關係，不受這社會的經濟意識的影響而生存的。香港社會中，中下層白領階級的人很多，而專心致意研究學問的人卻很少。人們往往感慨地說：香港是一個繁盛的都市，同時也是一個文化的沙漠！這和香港的社會經濟之發展背景，有極為密切的關係。

香港教育，在發展上，和它的歷史、文化、社會、經濟等這幾方面的背景，血脉相通。這些背景，也影響了香港教育的目標、形式和它發展的方向。

附注

〔1〕參考李璜著：《讀史之頁·談文化與文化復興》。

〔2〕見阮柔著：《香港教育制度之史的發展》，十八至二十四頁。

